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
第112期(民國110年6月),161-168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

馬世嘉（Matthew W. Mosca）著，羅盛吉譯，《破譯邊疆・破解帝國：印度問題與清代中國的地緣政治的轉型》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19。511 頁。

蔡長廷*

近年來，「新清史」在中國大陸、臺灣學界受到廣泛討論，被歸類爲此學派研究者的主張是，重視滿文檔案使用，重新審視清帝國統治的性質，認爲清帝國不僅是中國王朝之一，更因是滿洲人所統治而有其特殊性；同時從比較的視角，將清帝國與同時期的其他帝國進行考察。[1]從此主張出發，這群學者不僅著力於清帝國的內部議題，更延伸到邊疆政策、美術史等諸多領域，如米華健（James A. Millward）的 *Beyond the Pass: Economy, Ethnicity, and Empire in Qing Central Asia, 1759-1864*、濮德培（Peter C. Perdue）的 *China Marches West: The Qing Conquest of Central Eurasia* 等；[2]這些研究不同於中國傳統的西北史地研究，而是將其放在世界史的脈絡討論，此種視角可與上述同時期帝國間的比較考察相互呼應。[3]馬世嘉（Matthew W. Mosca）近著《破譯邊疆・破解帝

* 中原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兼任助理教授

1 歐立德，〈滿文檔案與新清史〉，《故宮學術季刊》，卷 24 期 2（2006 年 12 月），頁 1、7-8。

2 定宜庄、歐立德，〈21 世紀如何書寫中國歷史：「新清史」研究的影響與回應〉，收入彭衛主編，《歷史學評論》（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3），卷 1，頁 120-121。James A. Millward, *Beyond the Pass: Economy, Ethnicity, and Empire in Qing Central Asia, 1759-1864*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中譯本見米華健著，賈建飛譯，《嘉峪關外：1759-1864 年新疆的經濟、民族和清帝國》（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7）。Peter C. Perdue, *China Marches West: The Qing Conquest of Central Eurasia* (Cambridge, MA; London: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2005); 中譯本見濮德培著，葉品岑等譯，《中國西征：大清征服中央歐亞與蒙古帝國的最後輓歌》（臺北：衛城出版社，2021）。

3 Peter C. Perdue, *China Marches West: The Qing Conquest of Central Eurasia*, p. 9; 濮德培著，葉品岑等譯，《中國西征：大清征服中央歐亞與蒙古帝國的最後輓歌》，頁 36-37。

國：印度問題與清代中國地緣政治的轉型》（*From Frontier Policy to Foreign Policy: The Question of India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Geopolitics in Qing China*），延續上述清帝國邊疆史研究的主張，更因處理大清帝國與大英帝國的互動，突破了歷來新清史研究多聚焦於西北或北部邊疆的問題，將關注重心移至西南到沿海；更難得的是，如同著作的標題「從邊疆政策到對外政策」，本書提出有別於費正清（John K. Fairbank）「中華世界秩序」的研究論述。

作者在本書提出的問題是：清朝的君主、官員、學者如何解釋 1750-1860 年間在印度崛起的英帝國強權，此一理解又如何影響他們提出或執行政策以維持帝國安全（頁 30）？其解答是梳理出大清帝國處理邊疆事務的原則從「邊疆政策」到「對外政策」的轉變過程。本書架構龐大，除前言、結論外，共分爲八章，根據時間依序論述。筆者將其分爲三個主題，分別是「地理學知識體系的運作與轉變」、「清帝國與英帝國、英屬印度的互動體制」、「從邊疆政策到對外政策的變遷」等三個主題。以下介紹此書梗概並試加評論，以就教於作者與學界。

一、地理學知識體系的運作與轉變

自戰國時期到清帝國統治的 1840 年代爲止，官方與民間所累積的大量地理資訊與知識，包括傳統典籍（《尚書‧禹貢》、《山海經》以及正史地理志）、僧侶、穆斯林的遊記與著作（《佛國記》、《大唐西域記》、《清眞指南》等）、耶穌會傳教士繪製的地圖與著作等。學者使用考證學方法來辨識書籍中大量新舊交雜的資訊，以釐清地名、方位、路程，因學者間的考證基準都不一樣，導致衍生出更多新名詞與新問題。如 1644-1755 年期間，清帝國對印度的理解遵循著上述過程，自漢到清指涉印度的名詞相互重疊，[4]這些名詞來自典籍、清

4　身毒、天竺、五印度、莫臥爾、榜葛剌、應帝亞、厄訥特黑（Enedkeg）、小西洋、欣都斯坦、大西天、甲葛兒等。Matthew W. Mosca, *From Frontier Policy to Foreign Policy: The Question of India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Geopolitics in Qing China* (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朝官員、歸降海盜、西藏人、耶穌會士、穆斯林，每個名詞都代表不同的世界觀與對印度的部分理解。但這些名詞並未整合，而是在著作中變成相鄰的地名或國度。第二種具有證據效力的記載，則是作者親身經歷。這可以從《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對相關書籍的評介中看到（例如明代官員黃衷的《海語》）。上述兩種具有效力的證據，也會因爲不同族群而有不同效力。如耶穌會傳教士的著作或地圖，儘管皇帝與學者都認爲其技術值得借鑑，但對其論述通常會保持高度懷疑。乾隆時期就以報導人資訊爲主，參考先前考證成果，製作了一份以新疆爲中心的印度地圖。所以清代的地圖技術儘管因爲借鑑耶穌會士的參加而有所進步，但仍然是以本國學者的考證成果爲基礎（頁 61-111）。

在 1756-1790 年期間，對準噶爾征戰的勝利與莫臥爾帝國崩潰後，清帝國持續向西征服喀什噶爾與葉爾羌，這讓印度的相關資訊出現在清廷的視野中。提供資訊者包含商人、旅人與官員，前兩者通常是穆斯林，而皇帝則較相信官員的調查報告。乾隆已將朝廷整合資訊的效率發揮到最大，也親自上陣進行印度地理名詞的考證與分析，並以滿文、漢文爲校訂梵文、藏文名詞的拼音基準，但對名詞的考證仍未制定基準，學者繼續製造出更多不同看法，使得對印度的理解更加零碎（頁 154）。1790 年開始，有七部西藏的作品逐漸在學者間流傳，大部分都由官員撰寫，但對於相關地理名詞的考訂與介紹，仍相當缺乏或存在錯誤。不過同一時間，私人學者藉由報導人與在朝中任官的同僚獲得清廷高層掌握的資訊（頁 302），沿海學者間開始合作校訂不同的地理名詞，嘗試將不同名詞相互關連，提出一套統合全部的詞彙體系，進而描繪出一套全貌式圖像，更試圖提出協調各邊疆的政策；與此同時，清廷刊行的研究著作降至低谷。清廷決定開始使用歐洲人的世界地圖與傳教士有關國外事務的書籍，逐漸形成潮流，而地圖的使用則是整合地理資訊的關鍵（頁 339-340）。

Press), pp. 25-66; 馬世嘉著、羅盛吉譯，《破譯邊疆・破解帝國：印度問題與清代中國的地緣政治的轉型》（新北：臺灣商務印書館，2019），第一章，〈許許多多的印度：清朝地理學常規中的印度，一六四四—一七五五〉，頁 61-111。

二、清帝國與英帝國的互動

清廷與外國互動的體制稱為朝貢體制或天下秩序，基本立場是維持和平、採取防禦，只要外國不侵犯邊界，則無意介入他國的事務。乾隆平定準噶爾後，連帶征服了喀什噶爾與葉爾羌，印度的資訊逐漸增加，因未涉及清帝國的邊疆安危，所以皇帝與官員的興趣都不深。1790 年開始，英帝國統治孟加拉，使得局勢產生變化，產生大量印度及其周遭資訊。清帝國對此地域的資訊仍停留在數十年前，直到廓爾喀戰爭發生，才開始獲得西藏以南的印度等地資訊。其中對於英屬東印度的描述就有法朗機（Farangi）、印度人（Indians）、英吉利人（English）數種，其中法朗機在藏語中變成佩楞（Phe-reng），這與藏語中的外國人（phyi-gling）相似，所以西藏方面就以佩楞與佩楞機（Phe-reng-gi）描述英屬印度（頁 214）。這些不同的指稱代表英屬印度的不同特性。另一方面，在面對英帝國在印度的擴張時，拔達克山、西藏、廓爾喀等地認為朝貢關係是一種對價的軍事聯盟關係，始終希望爭取清帝國的奧援，故而向清廷駐藏大臣提供有關印度與喜馬拉雅地域的戰略資訊。但即使清帝國已收集到相關資訊，並在哥薩因修士（gosain）提供的訊息裡得知「披楞」與廣東互通貿易，當馬戛爾尼使團到達北京時，清帝國仍未將披楞與英咭唎視為同一國家，更不清楚實際上英屬印度與廣州的東印度公司貨頭委員會（East India Company Select Committe）並非同一體系的產物（頁 229）。可知清帝國仍在朝貢觀念下應對印度問題，未能主動整合新舊資訊，更傾向於相信地方情報。

對廓爾喀的征戰是乾隆十全武功的最後一項，但清帝國對此地域未進行地理學分析，上述披楞與英國的關聯訊息也從未出過軍機處，所以無法提供學者們進行研究。值得注意的是，清帝國的邊疆政策不太倚賴地理學的名詞考證，而多倚賴當地報導人的情報決定西藏以南的地域軍事問題。當英帝國在印度的強勢崛起已是不可忽視的事實時，清帝國仍然用邊疆問題的角度來審視此一現象，未能進行整合性的資訊評估，對於地理學名詞的增加或消失都無任何反應。此種邊疆政策在 1830 年前仍能保持效率，但已無法應付日漸明顯的危機。

三、從邊疆政策到對外政策的變遷

鴉片戰爭後，最早對清帝國在地理學與戰略上的困境提出系統性論述的是魏源。魏源的專長是西北史地學，他花了數十年思索政策改革的細節，並在鴉片戰爭後訪問被囚禁的英國船長，寫下《英吉利小記》，接著陸續完成《聖武記》與《海國圖志》兩本具有影響力的著作。相較於汪文泰、鄭光祖、姚瑩等人的著作，魏源在方法論上不算獨特，考證甚至有誤，但優點在於他全面整合漢文資料中的地理學材料，並輔以地圖增進理解。例如他在印度相關詞彙中，就以「五印度」作爲主要名稱，把其他稱呼印度的詞及印度各區域視同中、東、南、西、北印度。此種方法能消化新的歐洲著作知識讓中國讀者容易吸收（頁400）。他也嘗試將內亞與沿海的戰略連結起來，重新詮釋廓爾喀史事，企圖翻轉過去清廷對英戰略的施力點。這可說突破傳統邊疆政策的思考，轉向了整體性的對外政策。雖然魏源的主張仍然未能說服同時代的多數學者與官員，但至少曾被清帝國的軍機處納入可能執行的選項之一。

本書的突破之處是以地理學（或稱邊疆史地之學、西北輿地之學）的學術思想史爲主軸，放在清帝國面對英帝國於印度崛起的政策脈絡中，探討清廷決策層對於地緣戰略認知的變遷。以下筆者針對上述三個主題中尙值得探討之處，略做延伸與補充。

貫穿本書的主題是晚清的學術思想史，從乾嘉以考據爲主的元史研究，到嘉道間出現魏源以考據爲手段、經世爲理念，兩者結合的《元史新編》，再到道咸以經世致用爲主的邊疆史地研究，此時知識界不僅重視研究邊疆史地，更擴大到對世界各國的認識與研究，其中尤以英國爲甚。[5]魏源的《海國圖志》在轉換清帝國的地緣戰略與呼籲需「師夷長技以制夷」上，對於晚清政府與知識分子具有重要啓發。[6]但更值得注意的是，魏源等人的知識結構對於變法圖

5　彭明輝，《晚清的經世史學》（臺北：麥田出版公司，2002），頁 56-61、189-191。

6　王家儉，〈魏源的史學與經世史觀〉，《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期 21（1993 年 6 月），頁 6。

強、重振國勢的影響。魏源歷史哲學思想，淵源於清中期開始流行的常州學派，以莊存與、劉逢祿爲核心的公羊哲學，認爲歷史是氣運變化不息的呈現，一切政經改革都須依循歷史發展的趨勢變化，這種「變」的思想屢見於其豐富的公羊著述，可說是他提出上述經世改革主張的根源。[7]在同治中興時期的政治家身上，同樣可以發現具有強烈的變革思想，這讓當時的官員更能支持並同意改革。[8]另一方面，魏源的邊疆史地研究師承自另一位常州學派學者李兆洛，[9]作者在認爲中國史地研究中的「沿革」研究傳統在李兆洛的著作《皇輿一統圖》、《歷代地理韻篇》後獲得進一步的發展，成爲其後研究者的範本。[10]在論述時，作者用「地理學」一詞論述此時期知識分子著重的「邊疆史地」、「西北輿地」等經世之學，然而後者其實包含比地理學更加廣闊的內涵，如能從更大的學術傳承脈絡考察他們的知識結構，考察公羊哲學、邊疆史地研究對此時期知識分子的影響，相信能更清楚呈現他們提出變革的知識背景。

再者，在上述經世改革的氛圍下，從官員到決策層似乎仍未能有足夠的警覺。林則徐在當時已是相當熟悉夷情的官員，擔任欽差時更聘用在英國殖民地工作過的漢人擔任英文書報翻譯，但在官方奏疏中對這些資訊都避而不報。戰敗後，被遠謫伊犁的林則徐除了將本身翻譯的《四洲志》贈與魏源，此書成爲《海國圖志》的基礎（頁 397-398），更在伊犁任上意識到俄羅斯對清帝國的威脅。可知林則徐儘管已有獲得多樣資訊並綜合判斷的方法，但上報皇帝時採

7　王家儉，〈魏源的史學與經世史觀〉，《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歷史學報》，期 21，頁 166-168；彭明輝，《晚清的經世史學》，頁 112；Benjamin A. Elman, *Classicism, Politics, and Kinship: The Ch'ang-chou School of New Text Confucianism in Late Imperial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0), p. 72; 艾爾曼著，趙剛譯，《經學、政治與宗族：中華帝國晚期常州今文學派研究》（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5），頁 47。

8　Mary Clabaugh Wright, *The Last Stand of Chinese Conservatism: The T'ung-chih Restoration, 1862-1874* (New York: Atheneum, 1966), pp. 63-67; 芮瑪麗著，房德鄰等譯，劉北成校，《同治中興：中國保守主義的最後抵抗（1862-1874）》（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頁 80-85。

9　與李兆洛同樣從事史地研究的常州學派學者還有趙翼、洪亮吉、董祐誠、張琦等人，但李兆洛可說是集常州學派史地研究之大成。參見大谷敏夫，《清代政治思想史研究》（東京：汲古書院，1991），頁 321-327。

10　大谷敏夫，《清代政治思想と阿片戦争》（京都：同朋舍，1995），頁 534。

取的仍是先前避而不報的處理方式。這顯示他雖然接受了新的世界觀與相關知識，在上報皇帝時卻仍用傳統的處理方式，使得從知識分子到決策層間呈現了處理方式的不連貫。

大多數關於自強運動的研究，均會提及林則徐、魏源等人的啓蒙之功。1861年清廷成立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開始用多邊交流方式處理外國事務，更被視爲一個里程碑。而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官署的組成、運作、影響等，更是學界研究的焦點。觀察擔任過總理大臣的 60 名人士中，出身進士者有 35 名、出身舉人有 6 名，可見他們的知識結構雖然仍以傳統知識爲主，但多受經世致用學風的影響，他們仍從閱讀西方譯著、報紙、駐外使節報告以及與洋人接觸來獲取資訊。[11]其中具有明顯「地理學」相關學風影響的大臣，僅有著述《瀛環志略》的徐繼畬。[12]其餘如桂良、文祥、沈桂芬等人，在知識結構、決策過程中受到「地理學」的影響爲何，值得更進一步探討。

最後提出的是，在清史研究中，對「帝國」概念的強調不只新清史的研究者，在日本學界也同樣受到重視，如岸本美緒、[13]杉山正明[14]等人所提出對於

11 吳福環，《清季總理衙門研究》（臺北：文津出版社，1995），頁 67-73、238-239。

12 芮瑪麗認爲任命徐繼畬爲總理衙門大臣是漢員掌管外交事務的一個突出例證，更受到當時洋人衛三畏的重視。吳福環，《清季總理衙門研究》，頁 67-73、238-239；Mary Clabaugh Wright, *The Last Stand of Chinese Conservatism: The T'ung-chih Restoration, 1862-1874*, pp. 228-230; 芮瑪麗著，房德鄰等譯，劉北成校，《同治中興：中國保守主義的最後抵抗（1862-1874）》，頁 283-284。

13 岸本美緒認爲從「近世化」（十六至十七世紀）的角度看清朝的特色，是以世界的貿易熱潮爲背景，而興起於東亞—東南亞沿海地域的商業軍事集團，與同時期的東亞、東南亞地域國家比較，有對外交易的積極性、對多元文化的包容性、出現強力集權的君主等共同點。所以考慮清朝性質時，已不能從北方民族與農耕民族的對抗考察，而應從更大的世界史視野考察。岸本美緒，〈「近世化」論と清朝〉，收入岡田英弘編，《清朝とは何か》（東京：藤原書店，2009），頁 234-236。

14 杉山正明認爲帝國主要特徵是在具有單一絕對統治權力的君主下，將各種不同的臣民，如氏族、部族、集團、共同體、社會等都包含在內的政治統治實體。根據統治領域的規模、勢力範圍的不同，可分爲世界型帝國（World Empire, 十五世紀前的蒙古帝國、十五世紀後的大英帝國、現今的美國）、大帝國（Great Empir, 波斯帝國、羅馬帝國、秦帝國、漢帝國、帖木兒帝國、鄂圖曼土耳其帝國、大清帝國、沙俄帝國等）、中小規模的帝國（Lesser Empire, 北魏、北宋、貴霜、遼、西夏、花喇子模、倭馬亞王朝、阿拔斯王朝等）。比起魏復古（Karl August Wittfogel）考慮的族群屬性與中國史的框架，將清朝列入征服王朝的視角，較未考慮到清帝國與世界各國家互動的狀態，此種比較視角應該有更多論述的可能空間。參見杉山正明，〈帝国史の脈絡——歴史のなかのモデル化にむけて〉，收入山本有造編，《帝国の研究：原理・類型・関係》（名古屋：名古屋大学出版会，2003），頁 51、55-59。

世界歷史上諸帝國的特徵與分類。可見帝國史的比較研究成爲掌握世界史的途徑之一。1870 年代有關海防、陸防之爭與伊犁危機，都證明了領土防禦是一個多角交互關聯的問題，也就是本書中一開始所提出的藉由邊疆政策到對外政策的變遷，揭示清帝國「大戰略」（頁 40）的成形。值得期待的是，針對帝國間的大戰略議題進行更多比較研究。

綜上所述，本書充分利用多語言檔案、史籍與蒐羅相關研究著作，旁徵博引，在前人基礎上提出自身見解，更深入分析清帝國在面對英帝國的交涉與威脅時，內部的戰略形成、官僚機構的反應、地理學研究的變化以及學術與政治之間的互動等，使讀者能夠對清帝國樣貌有更多元、全面的理解。